

們要尋求公平和正義，當我們真正能夠揭示歷史的真實時，歷史的冤案我們也要敢於澄清，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擔當起一名知識份子的責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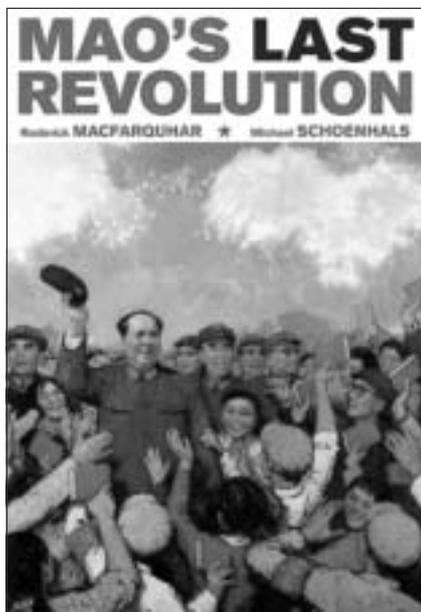
「林彪事件」真正能夠研究清楚，做到還歷史的本來面目，需要檔案資料的大量開放和黑匣子的成功解密。但是，檔案資料的開放是很難的，而且即使開放了，檔案資料曾否被篡改也難以確定；何況黑

匣子現在更不知身在何處。所以，這一事件的澄清看來會遙遙無期。但是，我們不能因此便放棄對它的研究。我們還要在資料不斷豐富的基礎上，站在公正的立場上，繼續探索。舒雲的這本著作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儘管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但是作者畢竟豐富了資料，而且提供了研究的新方法，開闊了研究的視野，對於這一事件的進一步研究，還是有一定作用的。

## 文革精英政治研究的權威之作

### ● 夏亞峰

西方學者對文革的研究始於文革初期，當時主要依據的是在西方可獲得的中國政府文件，他們試圖回答的問題是「毛澤東為甚麼要摧毀他親自創建的黨和國家機器？」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西方研究中國文化大革命最有影響的兩位學者馬若德 (Roderick MacFarquhar) 和沈邁克 (Michael Schoenhals) 合著了一部當今最權威的研究文化大革命 (1966-1976) 的通史性著作——《毛澤東最後的革命》 (*Mao's Last Revolution*，引用只註頁碼)，該書於文革四十周年的2006年由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是一部有關文革的全史，從文革開始前夜批判吳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宣告文革正式結束為止。馬若德曾任英國廣播公司 (BBC) 國際政治記者、英國國會議員，現為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沈邁克是瑞典的中國問題專家，現任瑞典隆德大學 (Lund University) 教授。

1986年，高舉和嚴家其共同出版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66-

1976》，可以說是文化大革命作為學術研究在中國的起步。該書運用中文官方資料，認為文革是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製造的內亂。1988年，王年一出版了很有影響的專著《大動亂的年代》。1996年，經中共中央批准，席宣、金春明出版《「文化大革命」簡史》，該書仍屬簡明通史性質。2008年胡鞍鋼出版了《毛澤東與文革》一書，是第一部由中國大陸學者所著的文革全史性著作。

西方學者對文革的研究始於文革初期，當時主要依據的是在西方可獲得的中國政府文件，他們試圖回答的問題是「毛澤東為甚麼要摧毀他親自創建的黨和國家機器？」馬若德和宣道華 (Stuart R. Schram) 是早期研究者的代表。到了1970年代中期，一批研究中國問題的研究生到香港做實地調研，訪談在香港的中國大陸難民，閱讀紅衛兵小報。他們研究的重點是文革基層參與者的經歷，採用由下而上的研究方法 (a bottom-up approach)，關注造反派與中國社會既得利益者之間的矛盾衝突。毛澤東和文革精英們的動機不是他們的研究重點。

過去二十年，隨着大批中共中央文件、領導人文選、年譜、傳記及相關人員回憶錄的編輯出版，西方研究文革的學者不少採用以精英為中心的思路 (elite-centered approach)，《毛澤東最後的革命》代表這一研究思路的最高水平。馬若德在其早期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三部曲中，論述了從1956年開始到文革發動前夜的中國高層政治。1956年，毛澤東開始對蘇聯模式的革命性表示懷疑；到

1966年，毛澤東積極謀劃將「修正主義者」從權力的寶座上拉下來。

《毛澤東最後的革命》一書充分利用1980年代初以來正式出版和非正式出版的各種資料，是目前已經出版的文革研究中最權威的著作。作者在全書引言中明確指出，「要理解今日中國『為甚麼』這樣，必須了解『文革』中發生了甚麼。要了解『文革』中發生了甚麼，必須了解『文革』是如何發動的」(頁1)。作者試圖回答以下一些關於文革的重大問題：對文革發生的暴力事件，毛澤東的個人責任是甚麼？毛與「四人幫」是甚麼關係？對文革的革命過激行為，周恩來有何責任？周恩來代表溫和力量嗎？文革的領導人如何支配紅衛兵、工作組和軍隊進行革命？「林彪事件」的真相是甚麼？毛去世後，「四人幫」怎樣被逮捕？鄧小平如何取代華國鋒成為最高領導人？但是，還有一些更為重大的問題，作者沒有涉及，例如：為甚麼中國民眾會如此狂熱參與暴力？文化革命怎麼會朝着精英們無法控制的方向發展？中國的政治文化支持毛的極端主義嗎？

全書共二十五章，第一章為引言；第二至十七章，大約佔全書的三分之二，敘述從1965到1969年的歷史，為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時期。從批判吳晗《海瑞罷官》開始，毛澤東開始向他親自建立的黨和國家機器進攻。作者認為，在這一階段，毛澤東鬥爭的主要目標是政治局委員兼北京市委書記彭真。到1966年5月，彭真、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中宣部長陸定一和中辦主任楊尚昆被打倒，「彭羅陸楊事件」宣告文革正式開場(頁39)，

過去二十年，隨着大批中共中央文件、領導人文選、年譜、傳記及相關人員回憶錄的編輯出版，西方研究文革的學者不少採用以精英為中心的思路，《毛澤東最後的革命》代表這一研究思路的最高水平。

毛澤東認為只有他妻子江青和她的「上海幫」才是其意識形態的真正繼承人。同時，毛也很清楚，「文革派」在治理國家方面缺乏經驗。在「林彪事件」後，毛決定恢復鄧小平及其他被打倒的「走資派」的工作。

無數的官員遭到解職和迫害。對「那些拒絕接受這一命運的人來說，自殺現象十分普遍」（頁43）。毛澤東贏得了第一次戰役的勝利。

下一階段，毛澤東的鬥爭目標是國家主席劉少奇。毛澤東輜晦之深令人驚詫不已。當毛澤東在1965年5月說「黨內的那些赫魯曉夫式的人物還睡在我們身邊」這句話時，甚至連最接近他的人也不了解他的真實想法（頁47）。毛堅信，只有先「天下大亂」，「才能達到天下大治」。作者認為，毛澤東是「利用教育部門的群眾運動以達到推翻國家主席的目的」（頁52）。1966年初，毛澤東對所謂中國第一張馬克思主義大字報的支持，使全中國陷入動亂之中。紅衛兵在學校造反，毆打教師和校領導，砸毀所謂的「四舊」，即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和舊習慣。由於工人造反派在工廠奪權，毛澤東不得不調動解放軍來控制派性武鬥。隨着黨和國家機關的癱瘓，由軍隊控制的「革命委員會」控制全國。

到1968年7月，紅衛兵的輝煌年代結束了。在以後的幾年中，數百萬紅衛兵和城市青年被送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頁251）。在1968年10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劉少奇被正式指控為「叛徒、內奸和工賊」，被解除一切職務，永遠開除出黨（頁277）。這一階段的高潮是1969年4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林彪被指定為毛澤東的「好學生、戰友和法定繼承人」（頁291）。儘管毛澤東希望九大成為「新與舊、好與壞、糟粕與精華、革命與修正主義的分水嶺」，但卻事與願違。作者指出，「九大是文化大革

命史的一個階段性而不是終結性事件」（頁285）。

本書第十八至二十五章為全書第二部分，論述了從九大結束到文革正式結束的歷史，敘述的重點是高層政治鬥爭，較少涉及社會史。作者認為，毛澤東變得更加猜疑。1970年8月在廬山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因設國家主席的問題與林彪集團發生分歧，開始對林彪發動攻勢。1971年9月，林彪、他的妻子和兒子因外逃飛機失事死亡。至此，毛澤東認為只有他妻子江青和她的「上海幫」才是其意識形態的真正繼承人。同時，毛澤東也很清楚，「文革派」在治理國家方面缺乏經驗。在「林彪事件」後，毛決定恢復鄧小平及其他被打倒的「走資派」的工作。

在外交方面，毛澤東也改變他一貫的反美立場，於1970年代初開始考慮改善與美國的關係。一方面，毛希望維護他的世界革命領袖形象；另一方面，他又不得已而與美國這個頭號帝國主義國家結成事實上的同盟關係，以便抗拒來自蘇聯的威脅，他為此而大受煎熬。毛一方面積極支持周恩來為改善中美關係所作的努力；另一方面，他準備隨時將周拋出來，作為改善中美關係所產生的任何不利變化的替罪羊。這解釋了為甚麼毛策劃1973年11月的政治局批周會議，以及支持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

毛澤東所設計的接班人計劃也歸於失敗。「文革派」妄自尊大，無法與老幹部合作。鄧小平也不願妥協而與「四人幫」結盟。1976年4月，毛澤東在去世前四個月，再次將鄧小平打倒，並縱容「四人幫」對其他

領導人展開政治鬥爭。毛澤東指定華國鋒為接班人，但華在毛去世後不到一個月，將江青等「四人幫」逮捕。華作為中國最高領導人的時間也不過兩年。在文革的最後階段，年邁體弱的毛澤東淡化軍隊干政、拋棄他親自指定的接班人林彪、打倒一批軍隊將領、解放一批老幹部。正如作者所指出，「文革的結束是如此痛苦地展開、如此折磨地緩慢，結束的時間竟是實際事件時間的兩倍」（頁281）。

在結論部分，作者將文革放在中國一百多年來追求現代化的進程中來考察，作者認為，「文革是毛澤東試圖使獨特的中國文化的精髓 (a distinct Chinese essence) 在現代世界得以確立和長久存在的最後的努力。毛的這一努力是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防線。」在過去三十年，中國也和東亞許多其他國家一樣，採用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方式，取得巨大的經濟成就。從這個意義上看，「文革已成為現代中國經濟和社會史的分水嶺」（頁460）。

筆者對本書關於文革大量精彩論述和作者對中文材料的熟練使用表示十分讚賞。但是，由於有關文革的新材料和出版物不斷出現，因此，很難說他們的許多論述是否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該書所涉及的課題很多，也難免存在不足和值得商榷的地方。例如，本書主要寫的是精英政治，對基層文革及民眾的參與情況涉及很少。

儘管該書的寫作對象是學者、大學生和一般讀者，但作為一部學術著作，對缺乏近百年來中國歷史知識的一般讀者來說，是不易閱讀的。該書在西方出版三年多來，受

到社會大眾媒體及學術界普遍關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國際先驅論壇報》(*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基督教科學箴言報》(*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等著名報紙，以及《美國歷史評論》(*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中國研究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等重要學術期刊都已刊登文章，對該書進行評介，並給予很高評價。哈佛大學《冷戰研究季刊》(*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以圓桌討論會的形式，邀請五位知名學者對該書進行評述，他們的評論文章由該刊於2008年春季號刊出。

著名中國史專家耶魯大學史景遷 (Jonathan D. Spence) 教授認為，該書使「人們可以感覺到毛澤東對所有與他有接觸的人腐蝕性的影響 (the corrosive effect)」，他稱讚該書「對文革感知性的 (perceptive study) 研究具有很高的成就」(封底)。哥倫比亞大學中國政治教授黎安友 (Andrew J. Nathan) 稱，「這是一部關於一個重要而又令人不解的歷史事件的經典巨著，作者對社會做出了重大貢獻。」(Andrew J. Nathan, "The Bloody Enigma", *New Republic* (on-line), 30 November 2006) 美國著名亞洲問題專家白魯恂 (Lucian W. Pye) 在《外交事務》上發表評論，稱「該書沒有試圖提出具有刺激性的新理論，作者悉心重構毛時代的中國精英政治，重點論述敵、友及人民公敵之間的聯盟分合關係」。(Lucian W. Pye, "Mao's Last Revolution", *Foreign Affairs* 85, no. 6 [2006]: 176)

由於有關文革的新材料和出版物不斷出現，因此，很難說本書的許多論述是否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該書所涉及的課題很多，也難免存在不足和值得商榷的地方。